

蕭公權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蕭公權著

中國政治思想史  
(上)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月新一版

中國政治思想史(上)

定價：每部全二冊  
精裝本新台幣三〇〇元整  
平裝本新台幣三〇〇元整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著作者：蕭公權

出版者：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二一一六號

發行者：中國文化學院出版部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于正路一號

電話：八六一〇九二三

郵撥：一〇一四二五號帳戶

門市部：華岡書城

地址：臺北市農安街三十五號之一

電話：五九四八四五五

印刷者：華岡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陽明山華岡大功館

電話：八六一一八六二

## 中國政治思想史

本書採政治之觀點，用歷史之方法，略述晚周以來二千五百年間政治思想之大概，以時代為經，派別為緯，貫穿我國典籍，取材以前人著作之具有理論價值者為主，論述先秦以來各家政治思想源流得失，並及歷代具有影響之政論。極為中外學術界推重，全書揭目五編二十五章，都八十萬言。在敘述各家思想，力守客觀之態度。偶有論評，亦意在辨明其歷史上的地位，是各大專學校政治、歷史科系的學生必備之參考書。

# 中國政治思想史

## 總目

### 緒論

-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一
-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三
- 三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之歷史背景……………八

### 第一編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創造時期

- 第一章 先秦政治思想之流派……………一七
- 第二章 孔子……………五〇
- 第三章 孟子與荀子……………八六
- 第四章 墨子……………一二六

# 中國政治思想史

## 緒論

### 一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起點

吾國歷史，世推悠久。溯其遠源，可至四千年以上。然研究政治思想史者，不能不斷自晚周爲始。此實勢有必然，非敢數典忘祖。三代以前，社會淺演，書契無徵，固不待論。卽夏商之世，文物制度尙在草創之中，學術思想殆亦方見萌芽，未能具體。況文獻不足，記載闕失，縱有學說，已難考見。孔子生春秋之時已歎二禮無徵（註一）。洪範九疇雖或爲夏禹政治之大法，而文辭簡短。商書雖多爲信史，而記載疏略（註二）。至於殷墟甲骨貞卜契券之文字，雖可據以推想古代之制度（註三），而究非學術思想之紀錄。凡此皆歷史家與考古家之重要資料，而就政治學之觀點論，殊覺其鮮裨實用。故吾人今日欲取中國政治思想作較有系統之研究，至早祇能以周代爲起點。蓋吾國古代文化至周而盛。吾人雖不必從夏會佑之說，謂「中國一切宗教典禮政治文藝皆周人所創」（註四），然學術思想之爲周人所創，則爲至明顯之事實。

周代學術之大興，不在西周盛世，而在東遷以後之春秋末葉與戰國時代（註五）。政治思想亦於此時突然發展，蓋自孔子以師儒立教，諸子之學繼之以起。「至戰國而著述之事專」（註六），持故成理之政治學說乃風起雲湧，蔚為大觀。吾人今日雖不能依據史實確斷其驟盛之原因。然就當時歷史環境之大勢，與乎文化進步之通則，尚可作大致不差之推論。政治思想興於晚周之主因有二：簡言之，即社會組織之迅速變遷，與偉大思想家之適生其會而已。周室自平王之末，已趨微弱。諸侯強大，「秦、晉、齊、楚代興」（註七），遂釀成春秋之局勢。封建制度既就崩潰，貴族之社會組織與生活亦同時發生變化。士族與庶人間之界限逐漸消失（註八），貴族原有從政掌學之特權亦普及於平民（註九）。史家所謂王官失守者，殆非虛構。且列國並存，相爭雄長。同文壹教之術猶未用世。思想自由，學無拘禁。處士得以橫議，「邪說」亦可大行。而國君圖強，每重才士。魏之文侯，田齊之稷下（註一〇），尤為戰國時代之著例。當此「天下無道」，社會蛻化之際，不僅爭亂頻仍，民生困苦，而舊日所以維繫人心保持秩序之風俗制度皆動搖崩壞，失其原有之效用。深思遠慮之士，對此鉅變之原因與影響，自不免加以疑問批評，而提出抗議或補救之方。政治思想，於是勃興。上述種種情形，春秋已見其端，至戰國而更甚（註一一）。故思想之發展亦至戰國而始極。然社會環境僅為思想萌芽之條件。苟無天資卓絕之思想家如孔、孟、莊、韓諸人適生此特殊之環境中，何能造成吾國學術史上此重要之「黃金時代」。故政治思想起於晚周，由於千載一時之機會。而吾人即以此時期為研究之起點，誠亦有其自然之理由也（註一二）。

## 二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演變之大勢

西人論吾國文化者每謂其偏於守舊。學者遂或疑吾國之政治思想亦歷久頓滯，古今不變。其實中國政論變化之劇烈迅速，雖未足與歐洲相比（註一三），然吾人略加探索，即知其確經顯著之重要變化。且可循其變化起伏之迹，而將此二千餘年之思想史分爲下列之四大段落：

(一) 創造時期 自孔子降生（西曆紀元前五五一）至始皇統一（紀元前二二一）爲時約三百年，包括春秋晚期及戰國時代，學者通稱之爲先秦時代。

(二) 因襲時期 自秦漢至宋元（紀元前二二一至紀元一三六七）爲時約一千六百年。

(三) 轉變時期 自明初至清末（一三六八至一八九八）爲時約五百年。

(四) 成熟時期 自三民主義之成立以迄於今。（三民主義之講演在民國十三年，其最初完成則在孫中山先生倫敦被難以後居英之兩年中，即一八九六與一八九八之間。）

先秦爲創造時期，其事顯明，無待贅說。然孔子自謂「述而不作」（註一四），門人復稱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註一五）。墨子「用夏政」（註一六），而其言每兼稱堯、舜、禹、湯、文、武（註一七）。道家二家，推尊黃帝。法家立言，且或以諸國刑書爲依據（註一八）。是諸子之學，悉有淵源，非盡出心裁，憑空立說。創造之名疑有未妥。吾人請釋之曰：創造者非無中生有之謂。春秋以前之人既有政治生活，豈無政治觀念。古籍如詩書所載天命民本，禮樂兵刑諸說皆經先秦各家所採用，而成爲中國政治



思想中之要旨。然此等舊說，原來既乏系統，含義亦較簡單。必分別經先秦大家之發揮董理，然後斐然成章，蘊蓄深遠，進爲一家之學說。此融舊鑄新之工作，實無愧於創造。譬如工師建屋，木石磚瓦皆仰給於成品，固無礙於堂構一新也。復次，漢書藝文志有諸子出於王官之說（註一九）。孔子從周，其教人之詩書六藝於諸子中殆最近官學。故章學誠謂「六經皆先王之政典」（註二〇），「孔子學而盡周公之道」（註二一）。以此類推，則先秦政治思想已具體於春秋戰國之前，儒墨道法之學乃因襲而非創造（註二二）。此論雖能成理，然不必與吾人之說相悖。請以儒家明之。孔子之政治思想雖以成王周公之制度爲根據，然非墨守成規，舉先王之政以爲後生之教。必於舊政之中，發明新義而自成一家之言，然後七十子乃心悅誠服，奉爲宗師。若其僅傳周公之政典，「符節匱合」，毫無損益，則詩書六藝，當時既爲官書，文武方策之政未經秦火，周魯所藏，得觀者豈僅孔子（註二三）。左傳所載春秋士大夫言談中能稱引詩書之文者不乏其例，何以儒家之學必以孔子爲宗乎。吾人如謂孔子就文武之成規，加以自得之創造，而之以爲設教立言之資，似較近情理而易通也。雖然，吾人認先秦時期爲創造，尙有一最重要之理由，爲上文所未道及而應注意者，則無論諸子學說之來源如何，其本身實「自我作古」，開後學之宗派。秦漢以至宋元之政治思想雖不乏新意義，新內容，而其主要之觀點與基本之原理，終不能完全越出先秦之範圍。必俟明清海通以後，外學輸入，然後思想爲之丕變。故研究中國政治思想史者，春秋以前可以存而不論，先秦時期則不能不認爲全部工作之起點。其所佔地位之重要，可以不言而喻。總之，先秦思想，對春秋以前爲融舊鑄新，對秦漢以後爲開宗立範，創造之名，由此而立，或不至於大誤。

先秦之創造，不由憑空杜撰。秦漢以迄宋元之爲因襲，亦非悉出模倣，步趨古學，而絕無進展與改易。始皇併吞六國，封建之天下一變而爲郡縣，創二千年專制一統之政體。社會之環境既殊，則先秦百家競起，各創新學之盛況，自亦難於繼續維持。同時正以環境不同之故，秦漢以後之思想家雖因襲前人之觀念與名詞，而政治之對象既已迥異，則其所持觀念之內容，與所用名詞之含義，亦勢不能與古人悉合。故嚴格言之，秦漢以後之政治思想不必有變古之名，而每有變古之實。吾人以此期之思想遠不如先秦之富於創造精神，而思想家亦多無意於創造，因以「因襲」稱之，非謂此千六百年之政論悉守晚周之舊也。抑吾人更須注意，先秦諸子，各立門戶，辯生末學，相攻尤烈。如孟拒楊墨（註二四），荀非十二子（註二五），墨氏譏儒（註二六），莊生評鶩諸家道術（註二七），此皆最著之例。當時雖意在尊師說，息異端，然不過入主出奴，各有是非，交相勝負。正如羣雄角逐，未知鹿死誰手。及至秦漢各家後學相攻已久，接觸已多，於是互相折衷調和，而寢有學術混同之趨勢。放棄門戶之見者遂成雜家之學（註二八），堅持門戶之別者亦參採異端，以與師說相糅合。參合之限度不同，故學說之純駁不一。因此周末及秦漢學術每呈下述之二態。一爲學派之名號猶昔，而思想之內容有異。二爲一派之中間有分支，而數派之間反相混合（註二九）。自此以後，先秦學派之能繼續存在者，雖尙壁壘森嚴，而所守者不過舊學之主旨。其變易之尤甚者或至體貌不殊，而精神迥別。然既仍互相爭辯排斥，則其求勝之心，無異於古人。政治統一之後，專制君主每欲致思想之統一。始皇「以吏爲師」，武帝推尊儒術。此種「別黑白而定一尊」之辦法，未必遂能消滅諸家爭勝之心，使其相攻，趨於和緩。故秦漢以後爲學術內容調和之時期，亦

爲學術派別決戰之時期。秦亡後之千餘年中，各派相爭雄長，隨歷史環境之轉變而相代起伏。或先盛而後衰（註三〇），或既廢而復興（註三一），或一時熄滅而不再起（註三二）。或取得獨尊之地位而不能壟斷全局（註三三），或失去顯學之勢力而仍與主潮相抗拒（註三四）。思想之內容雖隨時代而屢變，其大體則先秦之舊。絕對新創之成分，極爲罕見。

因襲時期政治思潮流衝激之大勢，簡言之，乃中國學術上之長期內戰。其交戰之團體爲中土固有之學派，其爭鬥之利器爲先秦舊創之學說。千六百年中僅南北朝時代佛道二教關於致敬君父，分別夷夏等問題之爭辯爲異域思想參加戰爭之例外事實。然爲期甚短，對思想進展之趨勢，未有顯明之重要影響。學術內戰之結果，雖非政治思想之全部停滯，然中國君主專制之政體，自秦漢開端，此後殊少改變。先秦思想既以社會環境之劇變而驟興，秦漢以後之思想亦以社會環境之變動較少而缺乏創造之成分，此誠一極自然之現象，毫不足異。苟非明清時代西洋之武力與文化藉海通而相繼不斷侵入中土，恐政治思想之因襲時期或不能至宋元而終止，其轉變時期亦未必至明清而到來也。

吾國政治思想轉變之直接原因爲外力之刺激。佛教東來，開異族文化侵入之端。五胡亂華，露異族入主中國之兆。然二者雖促成政治社會宗教哲學各方面之騷動與進步，而未曾引起政治思想之轉變。蓋佛教爲宗教而非政治思想，其消極出世之人生觀又適與老莊思想有相近之處。其不能對政治思想有所貢獻，亦意中事。至於晉代亂華之諸胡，其文化均低。佔據中原以後，文化則自動「用夏變夷」（註三五），政治亦不能越出建號稱王之故智，尤不易有促動思想轉變之能力。必俟明清時代海通之後，歐洲之高

度文化隨傳教士而播於中土。加以閉關自守之局既破，昔日大一統之「天下」突然變爲世界上列國之一。而積弱之餘，更屢爲外國所侵侮。如此空前鉅變，自不免激起思想上之革命。此殆爲轉變時期見於明清之主要原因。再則蒙古入主中國，約一百年。人民備受異族之欺凌荼毒，儒家之仁義禮樂，法家之尊君重國，明法飭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無爲，以及一切中國固有之政理治術，均經歷史之事實證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則窮極生變，明清政治思想自不得不另闢途徑，向新方面以前進矣。

轉變時期雖包括明清兩朝之五百年，然明代以至清初不過略見轉變之端。除舊更新之大轉變，直至晚清，然後發動。蓋明清之初，遺民志士以反抗異類政權而發揮種族思想，一變傳統思想中之大同主義。中明以後陽明學派以反對宋明理學之桎梏而發揮自由思想，亦圖衝決網羅，肅清尊古守舊之結習。凡此雖具重大之意義，明示轉變之方向，然其本身所據觀點與所含內容，仍自舊學中蛻化而來，終不脫前人之窠臼。雖知革故，未逮鼎新。及至太平天國崛起，始本基督教義，參以民族思想而產生吾國空前之思想轉變。此後則戊戌維新，辛亥革命，無論其所持之主義爲何，其受西洋思想之直接影響，而與二千餘年傳統思想相對抗，則不謀而合。吾人斷不可因新思想中每接受舊學說之一部分，遂疑其仍與先秦以來之「道統」完全一貫，良以清季維新及革命思想家之採用舊說，皆按自立之標準。其採用一家之言，非以其爲古聖先賢之說，而以其適於現代國家之用。權衡在我，取舍從心（註三六）。思想自主之風氣，殆爲先秦以後所創見。

辛亥革命，思想爲轉變時期之結局，亦爲成熟時期之起點。孫中山先生之三民主權學說融會古今

，貫通中外，運獨到之特見，集一代之大成，不僅樹革命之理論基礎，而立國之根本大道，亦於是完成。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至此乃臻成熟之境。

### 三 中國政治思想史之分期——按思想之歷史背景

上文就二千餘年中思想演變之大勢，而分爲四期，雖不盡妥，或無大誤。吾人又可就思想之歷史背景而畫分爲下列之三時期：

(一) 封建天下之思想 包括春秋及戰國時代，與上述之「創造時期」相當。

(二) 專制天下之思想 包括秦漢至明清之二千年，與「因襲時期」及「轉變時期」之前大部分相當。

(三) 近代國家之思想 包括清末戊戌維新時代及辛亥革命以迄今日，與「轉變時期」之後部及「成熟時期」相當。

政治思想與政治制度相推移。以故政治思想史亦可按制度演變之大勢而分期。吾國政制自商周以來，凡經三變。商周之際，部落社會（註三七）漸進而成封建天下（註三八），此爲一變。始皇併吞六國，畫天下爲郡縣，定君主專制之制，此爲二變。晚清失政，民國開基，二千年之君制遂告終止，此爲三變。段落分明，早爲人所共喻。吾人若按此政治制度史之段落以畫分政治思想史之時期，誠極自然之事。

封建天下之政治思想不發生於周代極盛之時，而興起於就衰之後，上文已略述及。故先秦之思想均

以封建天下爲其背景，而不必悉以之爲對象或理想。試舉諸家之著者言之，如孔子「從周」(註三九)，其思想以封建天下爲背景而兼理想者也。孟子百里可王，天下定一(註四〇)之說雖不尊周，而亦未否認封建之理想。墨子「非攻」實爲對戰國侵伐兼併之抗議，其「尙同」之說明揭「國君」「家君」(註四一)壹義之事，則亦純然爲封建天下之思想。道法二家，與此相異。老子近乎放任主義，莊子近乎無政府主義，二者皆消極對晚周政治作激烈之批評，而提出缺乏歷史根據之自由社會爲理想。法家如商鞅韓非諸人則承認戰國七雄爭長之實際情形而發爲富國強兵尊君重令之學說。其思想之背景既非盛周之封建，其理想又傾向於嬴秦之專制。故諸子之中儒墨擁護已就崩潰之封建天下，法家預想行將出現之君權一統，道家則否定歷史上之一切制度。

專制天下之政治思想以秦漢至明清之制度爲背景。先秦諸家各視其本身能否適應此歷史之新環境而決其宗派之盛衰，儒家適應之力最強(註四二)，故其道統最長遠，實力最雄厚，非任何宗派所能及。法家思想雖傾向於專制，且事實上爲嬴秦統一之基礎，似應大盛於專制之天下。然申韓之學自李斯致用之後，其法令名實諸旨漸已成爲實用之治術，終止學理上之發展，而其君臣守法，「令尊於君」(註四三)之要義則與君主專制政體之精神根本衝突，尤難爲人所接受。故秦漢以後，雖間有法家之言，終不能預於顯學之列，足與儒家相抗衡。專制政體得先秦法家之助而長成，乃旋即棄之不顧，使歸於微弱，縱非梟食其母，亦似得魚忘筌。專制天下之亂多治少，恐此爲原因之一。墨家本與儒家同爲封建天下之思想，而不能如儒之善變。加以「其道大毅」(註四四)，「若燒若焦」(註四五)，又不似儒具有詩書禮樂

，五行三統諸術，上足以「合文通治」（註四六），下亦可粉飾太平。故秦漢以後，宗風頓息，終專制天下二千年中遂成絕學（註四七）。道家思想之時間性，較諸家爲最少。其消極之態度始終大體一貫，未曾因封建天下之改爲郡縣而有根本之改易。故除在極短之時間，曾爲朝廷所採用，取得獨尊之地位（註四八）以外，老莊政治思想爲專制天下時期反對專制最徹底之抗議，與儒家思想對立，略如野黨之於朝黨。每值盛世承平或方衰而未亂之際，則儒勝而道微。紀綱崩壞，生民困苦，則無爲無君之思想乘機興起。直至宋元以後，專制政體之發育達於極點，然後此抗議之聲始趨消息，而政治思想之中不復有獨立之道家宗派。綜上所述，足見專制天下時期政治思想之主要趨勢有三：（一）儒家思想由擁護封建制度一變而擁護專制政體，成爲二千年中之正統學派（註四九）。（二）儒家勢盛，而法墨同歸失敗。（三）儒道二家隨社會之治亂，互爲消長（註五〇）。

封建與專制兩時期之思想有一共同之特點，卽無論其內容如何，均以「天下」爲對象。其所異者封建天下爲合法之分割，專制天下爲絕對之一統而已。天下觀念之含義略近歐洲中世初期之世界帝國。其理想之範圍，至爲廣大。古人所謂「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註五一）者，最能表示此點。故嚴格言之，「天下」時期之一切政治關係皆爲內政，而無國際間之外交。至封建改爲專制，則並春秋時代，形似外交關係之聘弔盟約，亦完全歸於消滅。周秦以後，四夷時與中國爲敵，甚至侵佔中原，僭竊神器，事實上否定天下之觀念。然而自漢以來，論治夷政策者，仍多襲四海一家，安內柔遠一類之傳統思想（註五二）。其尤荒謬可笑者，如清乾隆五十八年英國使臣馬加特尼（註五三）之來，所乘舟車皆

令懸英吉利朝貢之旗。覲見皇帝，強之行跪拜禮。高宗與英王之敕書復有「傾心向化」「航海來庭」等語。此皆明白表現國人根本缺乏國際觀念之事實，而推原此政治唯我論（註五四）之由來，天下本位之思想殆應負一部分之責任。復次，專制天下之思想，頗有大同主義之傾向。忽略族類之區分，重視文化之同異（註五五）。其結果遂致二千年間，中國勢盛，則高唱「用夏變夷」之理論，外族入主，則遷就政治屈服之事實。祇須征服者行中國「先王之道」，同化於我，則北面稱臣，承認異類之政權，亦毫不愧恨。民族思想發育不良，此為專制天下思想之又一結果。

綜上所學各端，一言以蔽之曰，缺乏近代國家之觀念而已。近代國家之品性為何，雖無絕對之標準以資判斷。然按世界各國政治經驗之通例言，則所謂近代國家，至少具有下列之數特點：（一）樹立民族自主之政權。（二）承認列國並存，彼此交互之關係。（三）尊法律、重制度，而不偏賴人倫道德以為治。上述三端歐洲主要之國家在十五世紀以後已粗具輪廓，迅速發展，至十六、七世紀而大體成熟。吾人若就十八世紀以後之情形論，則（四）擴充人民參政權利一端亦可認為近代國家特點之一（註五六）。此四種品性，吾國當專制天下之時期固完全缺乏，即在封建天下之分割時期亦僅略有痕迹，似是非而非。二千年政治思想之醞釀衝激不能產生近代國家之觀念，此實歷史環境之所限，不足以為前賢病。亦猶歐洲古代思想家之注目於市府，中世之醉心於帝國，必至近代，然後有民族國家之理論也。

歐洲近代國家之發生與長成，先於中國者數百年。以開國之遲早論，則我老大而彼少壯，以政治漢化之程度論，則彼先進而我晚成。兩者相值，強弱立判。明季清初，西洋教士雖已東來，國人尙狃於專



制天下之結習，對其所傳來之西學，未發生普遍之影響。必經辛丑、庚申、甲午、庚子諸役喪師辱國，然後朝野人士始漸覺專制天下之舊制度舊思想不足以圖存。於是效法西人，維新變法之議大起。歐美近代國家觀念乃傳入中國，與傳統思想互相爭鬥，局部調和。陸離璀璨，蔚爲大觀。先之以戊戌維新。繼之以辛亥革命。至孫中山先生集全局之大成，而吾國政治思想之第三期於是正式開始。

吾人就不同之觀點，試擬兩種之分期，其結果竟大體相符合。足見所擬雖未必盡善，而大致不誤，則可斷言。本書下文即按此分期，將二千餘年之政治思想史，次第作扼要之敘述。

(註一) 論語八佾第三。

(註二) 王國維古史新證認商書除湯誓外皆真，周書洪範可疑。

(註三) 參周傳儒甲骨文字與殷商制度。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

(註四) 中國古代史頁二九，孔子謂「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謂「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是不以周爲新創。

(註五) 平王元年遷都洛邑(前七七〇)。春秋始於魯隱公元年(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終於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戰國時代之起迄尙無定說，姑以春秋終止以後，始皇統一以前之二百五十九年當之，即敬王四年至始皇十六年(前四八〇——二二一)。

(註六) 章學誠文史通義卷一，詩教上。

(註七) 國語卷十六鄭語。史記卷四周本紀亦有同樣之記載。

(註八) 如左傳昭公三年載晉國「欒、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又如寧戚飯牛而見用於齊桓公，百里奚貧賤而事秦穆公。